

襄陽民國人物

襄陽文史資料第五輯

襄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襄陽民國人物

襄陽文史資料

第五輯

革命忠誠者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襄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八〇年九月

封面题字：张贵轩

封面设计：王宝鉴 李家元

《襄阳县文史资料》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襄阳县委员会
第五辑	编辑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九月	印刷	襄樊日报印刷厂

内部准印证：(1990) 鄂襄市图内字第003号
工本费 2.40元

目 录

序.....	襄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吴永明 (1)
刘公轶事.....	刘发慧 (4)
共进会总理刘公慷慨捐款助革命.....	李春莹 (16)
襄阳爱国启蒙教育家——陶际唐.....	陶鹏远 (20)
先祖父暨先父母事略.....	陶春晖 (28)
附：在台亲友追悼柏青先生暨德佩丘夫人逝世的 挽联诗词选录.....	(32)
热心公益事业的陶氏父子.....	王兴军 (36)
丁士杰.....	卓 坤 (39)
附：丁青云先生殉难碑记.....	(40)
务真求实 抱一而终	
——鄂西北中共党组织主要创建人李实...县党史办	(44)
沿着爷爷走过的路走下去.....	李宇庆 (69)
自古志士多才子 丹心一片照汗青	
——马适安烈士传略.....	孙久金 (74)
曦呈大地晓 轡系一天红	
——忆先父董曦轡烈士.....	董佩蓉 (96)
附：(1) 董曦轡烈士遗作	(101)
(2) 《追悼董曦轡烈士悼词》(节抄)	高如松 (102)
(3) 祭五分钟爱国心文(摘录)...潘慧庵	(103)

苍松翠柏掩忠骨 英烈业迹育后人

——怀念董振烈士 董佩蓉 (104)

附：一《襄阳董振同志被难》——原载1927年

5月27日汉口《国民日报》 (111)

二董振遗诗一首 (111)

从牧童到教授

——忆薛愚 张英侠 (113)

附：《人民日报》1988年1月29日载：“全国政协委员薛愚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 (129)

薛愚家史及其童年 虎贲山口述
李运生整理 (130)

访薛愚教授 陈超远
王 玉 (133)

七十自述 杨一如 (141)

杨一如轶闻 陈百祥 (147)

附：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呈报“处置杨一如案”文件——原载1927年9月13日汉
口《国民日报》 (152)

我所知道的李朗星 庞盛文 (153)

李朗星小传 段祖国 (160)

李朗星轶事拾遗 严德修 (165)

终其身作为共产党的好朋友

——忆先父杨立生 杨明玉 (169)

缅怀肖楚女和杨立生二老师 燕文新 (182)

忆先父张文伯 张先迪 (188)

回忆我的父亲陆云龙 陆健民 (194)

不拘一格的陆云龙 康乐生 (207)

孙守真先生与襄阳县立初中 陆健民 (211)

襄阳县中创办人之一——王伯华……	王 玉 张士龙 供稿	(219)
怀念先父潘慧庵	潘正秋	(223)
自述	张子野	(229)
更爱黄花晚节香		
——怀念我的哥哥张子野	张先迪	(236)
名医宋伯公	宋家瑞 宋美幻	(248)
办学育才 造福桑梓		
——记热爱教育事业的孟昭信	张明善 李文翰	(253)
济难好义的孟昭信	韩作黎	(256)
敢于碰硬的律师庞敬三	杨学端	(258)
功在桑梓		
——记鄂豫边联防队第三大队长刘杰	李文翰	(262)
蜚声一时的姚岷皋	张敬初	(266)
编后		(270)

序

经过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同志们的辛勤努力，襄阳文史资料第五辑《襄阳民国人物》即将付梓成书。本书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代表人物24人，计35篇15万余言。它不仅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襄阳历史提供了一份丰富的资料，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人又不仅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关系，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襄阳文史资料第五辑收录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维系着时代的风云，透过他们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襄阳民国时期活生生的历史现象，看到当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襄阳乃至整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历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祖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无数仁人志士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许多曲折和挫折、流血和牺牲，但是都失败了。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产生了中

国共产党后，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长期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终于结束了受欺凌受屈辱的历史，赢得了独立和解放。襄阳的历史进程，是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民国时期襄阳人物的曲折经历，他们人生成长的道路，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只有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进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发展和振兴。认真阅读《襄阳民国人物》一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必胜的信心，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本书收录的多为“三亲”史料，其中包括儿女忆父母，妻子传丈夫，学生思老师，部属话长官，亲朋写故交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真切感人。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先后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经过严格筛选和鉴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既不妄贬，也不溢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应当感谢本书的编者，正是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使这些宝贵史料得以昭示后人。这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乡土教材，循着书中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出，个人的志向与抱负、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成长的历程，必须与历史潮流相融汇，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在历史上放射出耀眼的火花。民国时期襄阳人物的沉浮荣辱、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借鉴，从而有助于我们树立远大的革命理

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我们建设襄阳、振兴襄阳的热情，为襄阳历史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襄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永明

一九九〇年二月

刘公轶事

刘发慧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元勋刘公是我的二伯父，我是他的嫡侄。因为这种关系，我才有条件聆听父辈讲述和拜访幸存的武昌首义老人，以搜集二伯父生前死后的一些轶事。我已到暮年，想讲讲这些轶闻轶事，以示对先贤的怀念。

耕读世家 襄阳富室

我曾祖父兄弟二人，世人称刘荣芳为“刘大户”，我曾祖父刘荣达为“刘二户”。到祖父辈有兄弟四人，分为四房。我的祖父刘子敬，行三。

刘氏庄园座落在东津湾南大旺洲的上洲，“鸭头绿水”的汉江三面环绕，西与岷山高阳隔江相望，南以苏岭鹿门为邻。庄园四周是一两丈高的石脚砖墙，四角建有望楼。垣墙内一排四座八字门楼，门口有八级石阶，按大、二、三、四房分居。四祖父刘子麟，官至清廷度支部郎中，掌管全国盐务，在襄阳城北街另建有府第。庄园内雅静整洁，华屋朱檐，逶迤衔对，厅堂摆设古朴。门口有一池塘，水清如碧，游鱼可数。池旁有一凉亭，遍植垂柳，恰似《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门口金匾抱柱楹联很多，其中有一块金底黑字匾额，我记得上书“燕天昌后”，上款：“子敬伯父大人、

刘母陶太夫人六秩双寿”；落款：“愚晚侄孙文鞠躬敬贺。中华民国三年”。

刘二户四房有田地13000亩，我祖父系第三房，仅有田地1800亩。

我的祖父刘子敬系前清武举，崇文尚武，性格豪爽，爱结交四方文武。我父辈兄弟6人，大伯父耀琮；二伯父耀瑛，即刘公；三伯父少年夭折；生父耀珍，排行第四，一生料理田庄，支持二伯父刘公从事革命活动；五叔耀琛，留日病故，葬于神户；六叔耀璋即刘同。

二伯父耀瑛，字仲文，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留日时易名刘公，别号非非子；参加萍醴起义时化名刘耀湘、刘湘。自幼入家塾，祖父家教甚严，除非年节不得回家。不过，他性格豪爽，喜读《水浒传》，仰慕史进为人。后转到双沟陶王岗义学，随其舅父陶际唐就读新学，深受“维新图强，匡正时弊”的思潮影响，看到清廷时政日非，外患日迫，慨起革命之思，立振兴华夏之志。遂认为义学弹丸之地，见闻有限，想到文化发达的都市去访贤问友，以求救亡图存之道。

古都求贤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阳春三月，二伯父带上书童，沿官马驿路北上，直达六朝故都洛阳，游览了龙门石窟、白马禅寺、杜甫故居，拜访了前贤名士。旋即一路车马奔向古都西安，游览拜访近半载，经宝鸡西南行，在成都历时月余，由水路，到达重庆，结识了邹容。不久，买舟东下，游历了武汉三镇。时正值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办洋务，大批士子学人出国游学，蔚然成风之际。他游历求贤近年，回到家乡，时游

学之风已波及鄂北，同学朱绶光、邱平舟已东渡日本，表弟陶德琨已留学美国，遂起出国游学考察之念。当时他认为：英、法虽然强盛，但远在西欧，即使历史悠久科学发达，也不足效法。日本为中国近邻，原系海盗国家，明治维新不过几十年，已崛起为世界五强。揣度再三，决定东渡日本，考察政治经济，以酬振兴华夏之志。

二伯父对其父母说：“清廷废除科举，仕途已断，除非出洋游学，别无他法。”祖父虽然热衷功名，但怕被洋人留在外国迟迟未决，后经其倡导出洋游学的舅父陶氏多方开导，才愿筹措银两放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伯父自费赴日考察游学，肄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他联络同志，鼓吹革命，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推崇备至，极力资助，各翻印数万册，秘密输入国内，以振聋发聩。1904年与田桐、程家桢、宋教仁等发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于东京，印刷费由其资助。后入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与邹容、章炳麟并称莫逆。1905年秋，遇孙中山、黄兴于东京，率先加入同盟会。

《民报》出版又捐重金。为此，中山先生曾给我祖父写有收据和感激信，由我六叔刘同保存。我曾看到家里保存有《民报》等刊物，可惜毁于民国24年洪水。

1906年二伯父受中山先生派遣，回国参加萍醴起义，机密泄露，潜回家居3月。后复至汉口，图举大事，未果。他为避军警追捕，再次东渡日本。因深度近视，不适习武，转入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

1907年，二伯父与张伯祥、邓文翠等发起成立共进会于东京，亟谋发难于长江腹地。后被推举为共进会第三任总理。1910年秋毕业，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

国。

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省，昭示炎黄子孙同心协力，以铁血精神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二伯父本着这一宗旨，鼓吹革命，运动革命，奋斗不息。

假捐道台 真助革命

二伯父漂洋过海回国，沿长江逆水西进，会同在汉的共进会骨干杨玉如、潘善伯等创办《楚风报》。由于奔走革命，积劳成疾，暂返故里疗养。他抱病在鄂北、豫南运动革命，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军，联络江湖会准备响应起事。凡革命所需经费，总是慷慨解囊。

1911年3月，保路风潮高涨，共进会诸人切盼二伯父来汉主持会务，尤需经济上予以支持。适逢二伯父表弟陶德琨（同盟会员）新自美国归来，为筹集革命经费，同二伯父一道与我祖父周旋。陶知其姑丈（刘子敬）热衷功名，因此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表兄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二伯父知其父亲为清室顺民，不会轻易出巨资以推翻帝制。于是佯称：“倾蒙日驻华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而急需八千两纹银。”祖父知道按当时官价，八千两是不够捐道台的，经过三思，遂表示：“只要能捐得道台官职，即使二万两也在所不惜。”此事得到我叔祖父刘子麟的支持，倡议二万两银钱由四房公摊。恰在这时，二伯父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返襄迎二伯父赴汉。并以“捐道台在急”，敦促筹款。身为度支部郎中的刘子麟捐官心切，率先摊出五千两，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交给二伯父。二伯父抵汉不久，我六叔刘同到武昌县华林文

华书院就读，祖父又捐去三千两。后来各房陆续等足一万二千两，交当时任高等商业学堂教务长、藩署财政顾问官的陶德琨代为保存。

由于二伯父捐助巨款，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后，方有经费进行一系列起义准备工作，诸如派代表赴沪迎黄兴、宋教仁来鄂，购置枪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以及旗帜、文告，分遣同志四出联络等等，为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创造了条件。

党内总理 首义元勋

宣统三年（辛亥）五月，二伯父从襄阳乘船至武昌，与《楚风报》主笔杨玉如同住雄楚楼10号。此处遂成共进会领导机关。为了蔽人耳目，由杨玉如介绍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李淑卿与二伯父结合，作为家眷住在楼上，并在门口挂上“度支部刘”的牌子。

一天，宪兵营正目彭楚藩带班巡逻，听到雄楚楼10号人声嘈杂，推门进去，未等开口，二伯父挺身而出，喝道：“此处是度支部刘公馆，系朝廷命官，怎敢随便闯入！”并晓以大义：“这里是革命机关，我就是主持人。清廷腐败，丧权辱国。你这么年轻，难道甘作鹰犬，与其同流合污不成！”彭为之感动，说：“敝人早有同感，只是不得其法，报国无门。”于是要求加入共进会，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以致献出生命。

当时革命发展很快，二伯父和同志们都感到有加强通讯联络的必要。一致认为新军三十标正目、共进会员杨宏胜忠诚可靠，适宜此职。二伯父劝其退伍，给一千银元作资本，在新军左旗营旁赁屋开店，作为联络机关。杨常以“提篮小卖”作掩护，出入军营，传送情报，运送子弹，以致起义前

夕被捕殉难。

共进会仿效梁山泊“朱贵卖酒”，在武昌青土坡开设同兴酒楼。因经费不支，二伯父又给经理邓玉麟银元千块，作为联络经费。联络暗号：提领、握左手、右手抚胸，意在提纲挈领，严守秘密，同心协力。吸收同志入会，账上写为：某人欠银几两几钱几分，暗记标营番号。后恐日久事泄，改设同兴旅社于武昌巡道岭，专供联络同志之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团体有联合的必要。

9月14日，共进会、文学社在雄楚楼10号召开第三次联合会议，二伯父担任主席。为了表示联合诚意，讲道：“本人大都督名义，甘愿当众放弃。”党人恐群龙无首，二伯父遂派杨玉如、居正赴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共举大事；并让杨、居带银票五千两，托陈其美购买手枪，备起义之用。

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各标营代表一并参加，通过“人事方案”、“起义计划”，并推举二伯父任总理，主持党务、行政，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其家眷也随之迁至宝善里1号。

10月9日上午9时许，二伯父与孙武、李春萱等在宝善里机关点验党人名册，中华银行钞票，清理旗帜、臂章、文告。孙武试验炸药不慎燃爆受伤，二伯父命李将孙送往日租界同仁医院。当他下楼时，遇俄租界巡捕，他推说煤油着火，转眼出了宝善南里，翻穿上衣，灰制服变成蓝西装，卡上仁丹胡、戴上墨眼镜。当巡捕发现是火药燃爆，并抄出党人名册、旗帜、文告，认定是党人机关时，追上一看，面貌皆非。急问：“刚才穿灰制服的青年那里去了？”二伯父以日语回答：“往江边去了。”他支走巡捕，安全脱险，急

赴法租界长清里机关部，布置按计划起义。因为爆炸事件，机密泄漏，武汉总、分机关不断被破坏，二伯母、六叔和大师付秦明尚先后被捕。以致党人个个自危。在这紧急关头，二伯父会同张振武、邓玉麟、李春萱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按原计划举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口令。起义前夕，清朝当局戒严断江，二伯父被阻于汉口。

首义成功，推举总督，二伯父谦让再三，乃任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监察都督以次官员。后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鄂州约法》。

未几，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葛店。二伯父以大局为重，主持军政府，派人四出联络，电请各省派兵援鄂。并督率军队，竭力防守，组织奋勇军，保卫武昌城。以总监察名义布告城内外，人心初定。又通令各机关：有关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项，须得总监察批准。并以总监察名义，对大都督黎元洪擅离职守进行弹劾。

左军统帅 实业救国

革命大局初定，二伯父或明或暗遭到黎元洪排挤，深感总监察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当武昌组织北伐军时，即表示愿领兵北伐。黎元洪、孙武表示赞同，委以北伐左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之职。黎对左军人事、装备又蓄意掣肘，多方阻挠。幸亏二伯父资深望重，鄂北、豫南同志多愿随行，总司令部本部及先锋队、奋勇军共二千余人。因革命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前锋迅速进至唐河、新野、南阳等县。

1912年(民国元年)3月20日，二伯父统帅左军本部抵达襄阳，扩充实力，积极准备北进。此时，黎元洪指责他妨碍

议和，严令退出已光复的豫南各县。二伯父拒绝受命，与黎矛盾日深。

当时，襄阳城仍由荆襄招讨使季雨霖部团长林鹏飞任警备司令，机关驻北街老司令部。林部名义上受左军统辖，但因得黎元洪密令，遂不把左军放在眼里。左军总司令部驻襄阳城贡院（今校士街与红花园交叉口处），其部队却只准驻扎南门外落轿街及欧庙、李刘集一带。左军卫队营每天派兵巡街，以维持治安，林部也派兵巡逻，以张声势。一天，两队相遇，因林部不先倒旗致敬，发生摩擦。于是，林指示其副官收买总司令部卫队长李××，企图闯入卧室谋杀我二伯父，被我堂兄刘藻璠发觉缴械，送军法处审讯，供出实情。总司令部通知林开会，被拒绝。于是二伯父将其部队密调城内，分两路攻下警备司令部。林率部据守制高点鼓楼，负隅顽抗。卫队营士兵李长胜（东津湾人）自告奋勇，带领40名敢死队，智取鼓楼，活捉林及卫队长。增援部队相机攻上鼓楼，将其残部缴械。经军法审判，将林处决，后通报黎元洪。黎恼羞成怒，企图武力解决左军，但顾及二伯父系武昌首义元勋，未敢下毒手。

二伯父治军甚严，不准军队扰民。营长贺仁杰擅自率部到南漳石门，向富户赵叫化（赵魁记）勒饷，挖开地窖，将元宝、银元、铜钱押运至襄阳。二伯父手谕将贺军法处置。

鉴于上述问题，二伯父清除了旧官吏，整肃了司令部，任刘耀璜为军需处长，龚哲夫为秘书处长，陈鸣霄为交通处长，李华林为军医处长，罗祉恭为军法处长，副官处、稽查处、参谋处分别由骆佩、王殿一、徐万年主管。

左军在襄阳扩充了，湖北军政府却借故不发粮饷，通知其就地筹饷。所幸二伯父声望素著，巨商富户支持北伐，代为筹办粮饷，维持军需。我们家族也捐助不少。